

前些时候,中大中文系1982级的校友邀我欢聚。席上,他们拿出一本书稿送给我看。回到家,我在灯前展读,原来是82级的同学为纪念入学40周年,每人写下的诗篇,积之成册。

书中有人以传统诗词模式写下心声;有人则以新体诗歌细说衷肠;有些诗,回忆在康乐园学习时的往事,荡气回肠;有些文章,写毕业离校后工作和生活的种种体悟,情怀家国,兴会淋漓,充分体现出“中大人”特有的修养和个性。

我从1981年开始,一边从事教学科研,更多是负责中文系的行政工作。82级同学在学的阶段,也正是我担任中文系主任工作的一段时光。因此,他们在学的情况以及20世纪80年代大学教育的整体状态,我历历在目。

想当年,同学们都还年轻,本科毕业时不过廿一二岁。有些同学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毕业时也未到30岁。近40年过去,如今,好些同学已到退休年龄。偶读温庭筠的《苏武庙》一诗,有句云:“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丁年,是青壮年的意思。同学们离开母校的时候,不正是丁年吗?我记得,中文系82级同学在毕业20年的返校日,刘莹同学代表全校校友,曾邀我代撰写一副对联,以表心意,我写道:

四载同窗,爱到惺亭,壮心都在书琴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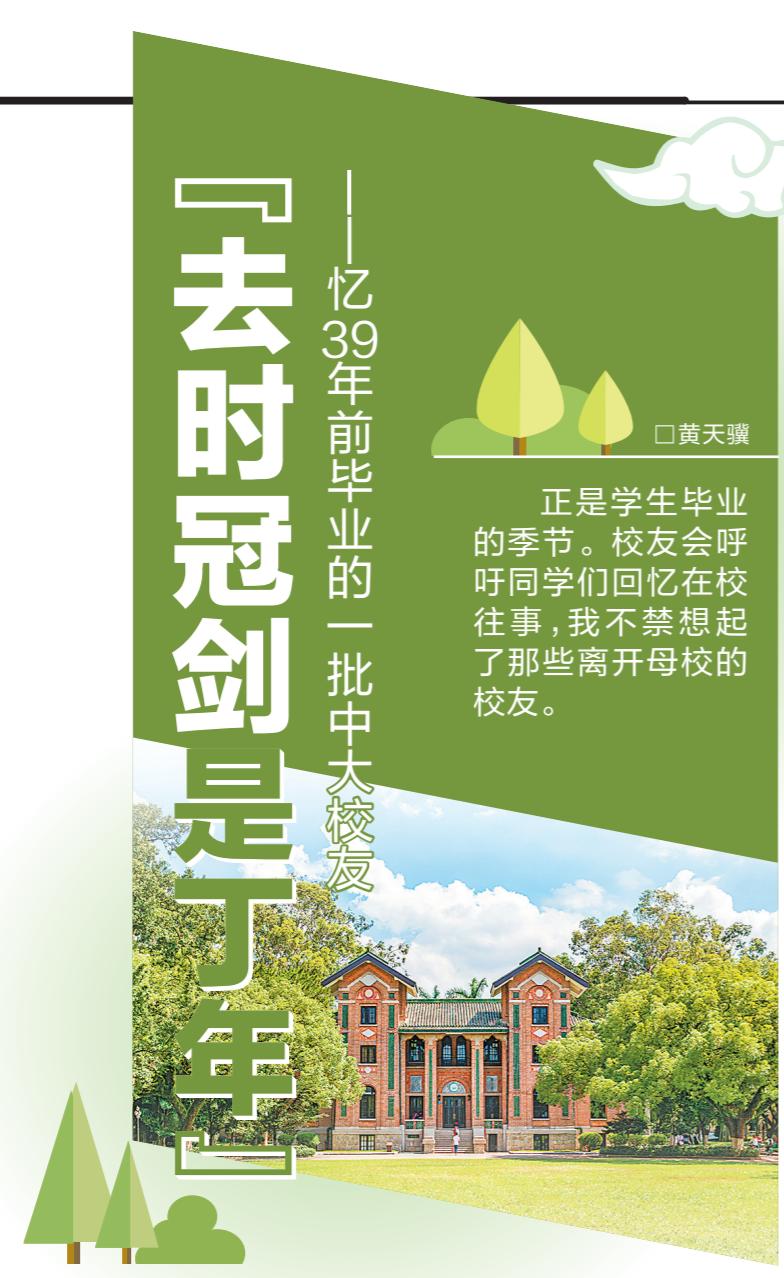
廿年分袂,情尚康乐,细草常怀露风

这联多少能道出同学们的心声。

屈指算来,又过了将近20年。

如今,我看到82级的校友,有的人繁霜染鬓;有的人当了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但都精神奕奕、谈笑风生。我便也想起20世纪80年代,包括82级同学在内大家意气风发的情景。整个80年代的大学生,和77、78、79那三届的学生都有所不同。

首先,他们在中学已受过比较完善的基础知识训练,书本知识掌握较多。这一点,比上述三届有优秀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没有像上述三届的同学那样,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作为学习人文科学的大学生,对社会和生活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当时的中学教育,逐渐出现强调“应试”的风气。周周考、月月考,把考上大学看成“人生的独木桥”。这一来,不少青



## 父亲的手, 在白粉笔和粗陶碗之间

□杨丽丽

我们家的木桌上,总摆着两个物件:半盒白粉笔和一个装着麦种的粗陶碗。父亲的手总在它们之间来回穿梭——有时沾着墨粉,有时带着泥土,分不清是粉笔灰染白了指缝,还是地里的盐碱渗进了掌纹。父亲的这双手,既丈量过课本里的唐诗宋词,也丈量过田间垄亩的长短,把教书和耕地两种生活都种成了岁月里的庄稼。

父亲握着锄头走向田野的背影,总让我想起戈壁滩上的骆驼刺。他的手掌宽大得能盖住半垄麦苗,指节因常年用力而微微变形,却能像犁铧般精准地划开板结的土地。掌心的老茧层层堆叠,摸上去像砂纸打磨过的榆树皮,可正是这粗糙的触感,让他能敏锐察觉土壤的墒情。沾着牛粪与草屑的指甲缝里,总藏着他教书更生动的农耕智慧——他知道何时播种能让麦种避开春寒,懂得哪块田该撒下苦豆子可以改良土壤。当他弯腰侍弄菜畦时,我又总恍惚看见他批改作业的模样,连拔除杂草的手势都带着图画书句的专注。田埂上的碎石子咯得人脚掌生疼,但他却能面不改色地站在上面挥锄翻地,汗水顺着皱纹流进土里,滋养着脚下的庄稼。

到了上课时间,这双沾着泥土的手会先在清水盆里反复揉搓,直到指尖的缝隙里不再渗出褐色。

父亲转身上站上讲台的瞬间,仿佛换了副筋骨。粉笔在他手中像指挥棒,在黑板上敲出清脆的节奏。有时讲到兴处,父亲会下意识地用手比画,于是那些沾着粉笔末的掌纹里,又落进了新的故事。他板书时手腕轻抖,粉笔灰便雪花般落在袖口,与在田间沾着的草屑混作一片。学生们总说,听父亲讲课就像听稼稼拔节的声音,带着土地里长出来的鲜活劲儿。冬天教室没有暖气,父亲的手常常冻得通红,握粉笔的指节裂开一道道血口子,可他依然坚持写满整块黑板,字迹歪斜却力透板壁,就像他在寒风中给麦苗覆上保暖的秸秆那般执着。

记忆最深的是,麦收时节,父亲在教室与麦田之间来回奔走的身影。正午的太阳把黑板晒得发烫,他擦着汗给学生讲完最后一道题,转身就扎进金黄的麦浪。镰刀在他手中起落如飞,麦秆断裂的脆响与课堂上的讲课声,在我耳畔交织成奇特的韵律。烈日下,他的脊背弯成一张满弓,汗水浸透的衬衫紧紧贴在背上,晒得黝黑的脖颈泛起盐霜。夜晚煤油灯下,他批改作业的手指还留着麦芒的刺痒,却能精准圈出学生作文里的别字,就像夏天挑拣麦穗里的杂草那样细致。

父亲总说,教书和种地是一码事。他指着田埂边的歪脖子枣树告诉我:“你看这树,年年修枝才能结好果。”转身又在作业本上写下批语:“文章要像庄稼,得舍得删去芜杂的枝蔓。”那些年,我用握粉笔的手教会我认字,用扶犁的手教会我走路,掌心的茧子蹭过我的手背时,粗糙里带着温热,像极了土地给予禾苗的呵护。春耕时,他手把手教我播种,说种子要埋得深浅适中,就像教学生掌握知识要循序渐进;秋收后,他带着我把麦秸堆成垛,说做事要有条理,如同作文要有清晰的脉络。

如今站在父亲耕耘过的土地上,风里仍飘着粉笔灰与泥土混杂的气息。黑板上的板书化作田垄间的麦浪,教鞭指向的方向,与犁铧开垦的道路,在时光深处悄然重叠。那些在粉笔与泥土间交替生长的岁月,终究长成了我生命里最坚韧的根系,让我懂得知识与劳作同样厚重,耕耘与育人皆是修行。

光阴似箭。“回日楼台非甲帐”,82级的同学们也陆续到了退休的年纪。孙中山先生曾教导我们,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以我的理解,就是说青年学生到社会上工作后,应该怀抱做大事的初心。但是,由于岗位不同,机遇不同,未必每个人都能做出大事。而“大事”又有不同的类型,未必都会惊天动地、名留青史。只要在不同的岗位上,好好工作、实事求是是地努力奋斗,就都是杰出的校友。

中文系82级以及其后几届的同学们,在学期间,师生团结,集体主义精神高涨,凡是参加全校合唱比赛和全校运动会,我们的口号就是:必须获取冠军。如果没有夺冠的把握,宁愿缺席。

在校庆70周年时,霍英东先生给中大建了三个网球场、一个足球场和“英东体育馆”,改变了中山大学缺乏运动场所的面貌。为了对英东先生表示感谢,中文系的运动队在出场仪式上接受校领导的检阅,走到主席台前时,队伍第一横排的运动员忽然张开手臂举起一个“英雄能用武”的横幅;接着,第二横队又张开手臂举起一个“东亚无病夫”的横幅。我记得,这几个大字,是请陈声声老师用近乎篆体的书法抄写的,苍劲有力。前幅的“英”字,与后幅的“东”字,皆用红色书写,其他的字则用黑墨书写,突出了“英东”两字,表达了师生对英东先生的感激之情。

当时,我也在主席台一侧,观看英东先生的表情,只见他热烈鼓掌,哈哈大笑,显得十分高兴。后来,黄焕秋校长对我说,霍先生不久又给我校增建了四个网球场、三个游泳池,让我的体育设施更加完善。老校长感觉到,霍先生再一次的慷慨,和我们中文系打出这新奇一招、让他知道中大学生的感恩之情,不无关系。

机构便发出号召,希望各方捐款,修补长城损坏的部份。当时,中文系的领导,立即抓住机遇,启发一些同学主动提出捐款修筑长城的活动。一时,师生热情很高,纷纷响应。这让我想起,抗战胜利后,中小学的学生常常会举行售旗捐款的活动,这对培养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很有效果。我又想,这做法比空喊口号或默默捐献都有意义。于是,我们和同学们商量,举行一次“修我长城,爱我中华”的售旗筹款活动。大伙儿经过研究,认为此策可行,它既能唤醒群众,也能锻炼大家的活动能力。

一经决定,我们立即分头工作。一方面请示有关部门,协助我们设计和制作一寸见方且可以贴在衣服上的五星红旗;一方面制作标语,制作开着缺口、便于群众把捐款塞进去的纸皮箱。然后,同学们戴上校徽,举着系旗,分头分

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学生的特点,我们特别注意让同学们有社会实践的机会,注意培养同学们进取和集体主义精神。记得82级同学在学期间,社会上有人提出:“万里长城万里长”的长城,日久失修,许多地方坍塌,急需修补,但缺乏资金,无法维持。有关

“俗”的一面?

王美怡:是的,但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广州不仅有“大排档”和“人字拖”,还有“雅”的一面。每当我漫步在西关的街巷,阿婆窗台上种着的花,流光溢彩的满洲窗,荔枝湾上的画艇,哪一个不美呢?更别说博物馆里收藏的美轮美奂的自鸣钟、广彩瓷器、广雕、广作家具了。

对雅文化的挖掘,是回到这座城市的历史深处,触摸千年商都的文化根脉。当我们沉静地回望,美的触觉便会苏醒。现代广州“务实有余,浪漫不足”,需要从岭南文化宝库中获取新的文化滋养和美学支撑。陈恭尹“九州南尽水浮天”的豪迈壮阔,黎简“山作其骨海作声”的雄直朴野,乃至粤剧红线女唱腔的文学与声乐之美……这些粤文化中的明珠应该被重新擦亮,渗透进当代广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 既有市井烟火,也有墨韵茶香

羊城晚报:您所定义的“广州雅逸美学”具有怎样的文化特质?

王美怡:我们经常说广州人很淡定,这就是一种“逸气”,这种逸气来自这个城市在漫长的中西贸易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传统。

广州在清末一口通商时期是见过大世面的,那时它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做生意的唯一门户。自鸣钟、象牙扇、广彩瓷器,当时行商生活的繁华富丽可以与宫廷相媲美。诗文酬唱、品茗赏画、金石收藏,广州的行商们不仅追随、效仿士人风雅,还扶持文人雅士刻印书籍,推动岭南文化发展。广州文化静水流深,它的雅逸美学具有中西合璧、务实与精雅交融的特征。这座城市的“家庭”是如此丰厚,它的风雅从来没有断绝过。

羊城晚报:但人们目前对于广州的城市书写,似乎更突出

羊城晚报:您是湘西人,为何选择来到广州生活并书写广州?

王美怡:广州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气质就是俗雅交融。我对广州城市中的烟火气和世俗文化,从来都是全盘接受和喜爱的。

上世纪90年代,我从湘西来到广州,这座城市最打动我的,就是个人置身其中随缘自在的生命体验。我在自序中引用了马尔克斯的一句话:“任何观念迟早都会被生命超越。”我发现,广州人的个体生命意识是超过其他城市的。过去在抗战年代,即使空中有敌机,花市上的妇女依然在精心挑选着花束。如今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穿着人字拖到小店门口喝一碗糖水的老广,他们的生命是恣意自在的。在这种自在的生命体验里,既有市井烟火,也有墨韵茶香。

## 让年轻人和城市发生新的对话

羊城晚报:您怎么会想到为新书设计一场融合影像、音乐、朗诵、剧场等多种艺术形式的首发式?

王美怡:我跟首发式的导演符文瑜是多年的好朋友。她是学戏剧的,我是写作的,我俩以前就经常在一起讨论,现在的平面文字很多人都读不进去了,哪怕你写得再好,但是他(她)就是没

办法静下心来读。我们就想通过多种艺术形式,例如影像的、剧场的、音乐的,来建构一个立体阅读的概念,帮助大家进入文字的世界,加深对文字的理解。

除首发式之外,年轻编辑们选用了一些生活化的广州老照片作为藏书票,重温城市的历史记忆:广州街头的女摄影师、珠江上的船娘、洋服广告旁卖排球的男孩、绣花的男孩等。这些老照片得到了年轻读者们的热烈回应。编辑和我说,他们也想在历史里找温暖。这一点挺令我高兴的,年轻人们能够在回望历史中获得精神支持。

羊城晚报:与《广州事情》同步首发的城市文学影像,是否还原出了您书中的诗意表达与文学质感?

王美怡:这部短片,是由一支非常年轻的95后电影团队制作的。他们从广州走出去,带着从海外学习的专业技能回国,重新感受和拍摄自己的家乡。拍摄与成片我都没有干涉,保证了影像制作的原创性。我和他们其实是两代人,我希望他们用年轻人的目光、年轻的手法来阅读这座城市。

我想通过这部影像传递一个信号:关于广州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因为拍摄,这群年轻人第一次踏进兰圃,深入这座兰香四溢的岭南庭院,去构想他们的城市故事。年轻的创作者们通过这种方式,和城市发生新的对话。

羊城晚报:您期待这种阅读体验,会怎样改变读者感知城市的方式?

王美怡:我特别关注《广州事情》出版后,年轻读者们对这本书的阅读和解读,他们怎么通过我的文字看广州。因为我觉得,只有年轻人才能真正地走到历史和文学里去,城市才会有新的生机和活力。

如果你生活在一座城市中,却厌烦这座城市,就会失去很多体验。湿漉的素馨花、香甜的杏仁糖、掌声鼓影里的荔枝湾……你看这座城市里有那么多美的瞬间。

只有我们和城市深入对话,才能和它建立起水乳交融的默契关联。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带领年轻读者们探索一个更丰富、更深沉、更美的广州。

## 壹 在历史土壤中开出文学的花

羊城晚报:写这样一本书,创作历程是怎样的?

王美怡:《广州事情》的酝酿过程很长,但集中的写作时间主要在去年一年内。书中用很大的篇幅书写了苏东坡、杨万里、屈大均、廖燕、阮元等人物,还原出他们在岭南的日常生活与文人志趣。在写作之前,我得把人物“吃透”,这就需要做很多史料挖掘和整理的工作。

如书中的《我见芸台》一文,我主要写了两广总督阮元在越秀山建立学海堂、集结英才赓续文脉的一段故事。但落笔之前,研究阮元的史料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除纸上考据外,我还去到了他的家乡扬州,身临其境地

感受他的成长环境。我感到自己与阮元之间有了很深的勾连,我正与他进行着穿越古今的对话。当我与人物之间产生灵魂共振时,我才开始写作。

羊城晚报:这种与书中人物的“神交”“共振”是如何发生的?

王美怡: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他们就站在我的书桌旁边,他们是我前生的知音。虽然“备菜”的时间很长,但“做菜”的过程却很快。

我的写作总是在自然、轻松的状态下发生的,那些文字仿佛是自己跳到我的笔端。我不会给自己的写作施加太多负担,带着一颗安静纯粹的心进入文字的世界,文字就会自然地流淌出来。

羊城晚报:您在写作中如何平衡学术性与文学性?

王美怡: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意淡化学术内容,文学想象的野马跑得很远。我在历史文献里泡了20多年,在历史土壤中扎根,却孕育出一朵文学奇葩。从历史的故纸堆里面走出来,重新回到文学创作,就像是自来水龙头被拧开了一样,有一种“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感觉。当我回归文学,感觉自己的生命本色重新显现。我在写作中获得了很大的生命乐趣。

羊城晚报:您曾谈到,《广州事情》的创作是对古典文化传统的回望与接续。

王美怡:我的创作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日常阅读也以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晚明小品、现代散文等居多。从陶渊明、王维到苏东坡、李商隐、姜夔,从张岱、袁宏道到周作人,我

用文字留下怅然远去的广州千年风雅,在历代岭南相关文人的诗文和笔记小品里拼接出土人风雅的生活画卷,呈现出难再回来的“纸上风景”。

羊城晚报:书中引用了大量诗词与古文,您是否会担心读者的接受度问题?

王美怡:我希望在书中埋下一些“引子”,引导年轻读者进入古典文学的世界,品味这些经过历史淘洗后留下的文字菁华,感受其中的力量和美感。只要我一直坚持这样写,年轻读者们就会体会到我的深意。这种“复古”的艺术尝试,还会延续到我接下来的创作中,我会在艺术手法上进行一些更大胆的尝试。

羊城晚报:您曾谈到,《广州事情》的创作是对古典文化传统的回望与接续。

王美怡:我的创作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日常阅读也以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晚明小品、现代散文等居多。从陶渊明、王维到苏东坡、李商隐、姜夔,从张岱、袁宏道到周作人,我

用文字留下怅然远去的广州千年风雅,在历代岭南相关文人的诗文和笔记小品里拼接出土人风雅的生活画卷,呈现出难再回来的“纸上风景”。

羊城晚报:书中引用了大量诗词与古文,您是否会担心读者的接受度问题?

王美怡:我希望在书中埋下一些“引子”,引导年轻读者进入古典文学的世界,品味这些经过历史淘洗后留下的文字菁华,感受其中的力量和美感。只要我一直坚持这样写,年轻读者们就会体会到我的深意。这种“复古”的艺术尝试,还会延续到我接下来的创作中,我会在艺术手法上进行一些更大胆的尝试。

羊城晚报:您曾谈到,《广州事情》的创作是对古典文化传统的回望与接续。

王美怡:我的创作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日常阅读也以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晚明小品、现代散文等居多。从陶渊明、王维到苏东坡、李商隐、姜夔,从张岱、袁宏道到周作人,我

用文字留下怅然远去的广州千年风雅,在历代岭南相关文人的诗文和笔记小品里拼接出土人风雅的生活画卷,呈现出难再回来的“纸上风景”。

羊城晚报:书中引用了大量诗词与古文,您是否会担心读者的接受度问题?

王美怡:我希望在书中埋下一些“引子”,引导年轻读者进入古典文学的世界,品味这些经过历史淘洗后留下的文字菁华,感受其中的力量和美感。只要我一直坚持这样写,年轻读者们就会体会到我的深意。这种“复古”的艺术尝试,还会延续到我接下来的创作中,我会在艺术手法上进行一些更大胆的尝试。